

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

明日之中国文化

张君勱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國思想史綱要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明日之中国文化

张君勱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政编码: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市市中印刷五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25印张 2插页 80千字

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209-02260-0
B·123 定价:9.60元

《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编委会

主 编 石 峻
编 委 刘德久
尹 铭
张利民
宋志明
陈志良
胡伟希
高瑞泉

总 序

在世纪之交的特殊时刻，人们更加热烈地展望、描绘未来，同时也以复杂的心情回顾、反思着过去。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发展道路，便是这种回顾、反思中的重要课题。应该说，这种回顾、反思不仅仅属于过去，而且联结着未来——联结着中国的21世纪。

人们要确切地了解一个时代思想学术的精神实际，首要在于明了它的社会背景，换句话说，先得吃透这个时代的各种社会矛盾，兼及主要矛盾双方的特点，以及它们在具体社会实践中错综复杂的交互影响，尤其在不断前进中体现的客观发展规律。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同样也离不开这一点。

大家知道，旧中国是贫弱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是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对象，虽还多少不同于当时仅是某一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过去，孙中山先生曾称之为“次殖民地”，那是很恰当的。但中国又是一个广土众民、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即是存在辉煌过去的大国，只是由于长期的闭关自守、政治腐败，乃至影响经济文化等的相对停滞不前，从而大大地落后了。同时由于思想学术没有实现近代化，没能大力发展实验科学的研究，导致综合国力不强，这样，就自然形

成了一种只有挨打的局面。于是西方各种思想，乘虚而入，也就是毫无选择地被介绍到中国来，难免令人眼花缭乱。由于当时人们对自己、外境还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并不真实地了解本国的国情，加之我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又演进得非常快，在思想界便产生了“盲目排外”、“崇洋媚外”等偏向，以致影响到，即使是立场坚定的爱国志士，一时也有未能跟上时代前进，确切知道什么是眼前中国真正需要的，……。历史在曲折中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代表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劳动人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这就使得旧封建势力与大资产阶级的各方代表自然结成了联合阵线，一致从事抵抗这种新思想，尽管他们各人的动机并不完全相同，面目也不一样；同时也有一些要求进步的学者、思想家，当时限于个人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仅从书本上了解到一点马克思主义，由于脱离具体革命实践，自然体会会有浅有深，一般说来，不可能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这就形成了1949年前非解放区思想学术界的五花八门。但在现实矛盾的发展中，又在酝酿着新的突破。

就与中国传统思想关系而言，思想家、学者们由于接受过去思想文化影响的不同，便有了标榜复兴儒、佛、道学说乃至墨、法……各家的差异。在学风上，有一部分人，喜欢迎合一些外来的新学术，于是，传统的中国学术思想，也有被披上一层外来资产阶级学术的外衣加以传播的。这同样是这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学术思想的一个特点。自然，其中也有从事比较深入研究而得出的成果，但也有多半出乎牵强比附、乃至臆造完全缺乏科学精神的，要融合东西文化，而且恰到好处，短时间是行不行的。

我们认为要比较全面而深刻地了解本世纪思想学术的全

貌，选取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代表作，经过认真的整理（包括校注），有计划地出版，是一项有必要的工作，所选著作中有的当时的名著，其它也都有一定影响、可供研究者参考的。我们这样说，自然并不意味着，这些著作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已经得出科学的结论。我们相信读者的批判断别力。

严格讲来，不具有高水平的理论修养，兼及工作上实事求是的精神，未过刻苦的钻研，是很难在短期内写出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专著。不是真正了解东西方思想文化本来面目和历史发展的，也很难融会贯通而成功地做出有创造性的新贡献。脚踏实地的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新思想，就得不断结合实践，时时进步，时时创造，以期熔铸古今中外文化精华于一体，这套《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的出版，无疑会从一个侧面开拓人们的视野，使不致割断历史，考虑问题更加全面而细致，对提高我国现代思想学术的研究水平，必将有所助益。

是为序。

石 峻

1996年9月25日于北京

重版引言

张君劢(1887—1969年),名嘉森,字君劢,一字士林,号立斋,笔名君房。1887年1月18日生于嘉定县城一个商宦之家。祖父张铭甫出身举人,曾任四川内江、屏山、垫江知县。父张祖泽为上海名医。张君劢12岁考入西式学校广方言馆,学习英文和数理化。1902年应宝山县乡试,考中秀才。次年考入教会学校震旦学校。后入南京高等学校。因列名参加抗议俄国入侵东三省,被校长勒令退学。

1906年春公费赴日本学习。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预科,1910年获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1911年回国后被清政府授翰林院庶吉士。辛亥革命后,返宝山县任县议会议长。1912年赴北京任农商部秘书。1913年至1916年期间,先后游学于德、法、英、比、俄、瑞典等国。1916年3月回国,出任浙江省交涉署署长。后曾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和北京大学教授等职。

1918年与梁启超一起考查欧洲各国战后情况。1920年移居耶拿从德国哲学家倭铿(Rudo If Eucken)专攻哲学,其间曾与柏格森和杜里舒等人接触,1922年偕杜里舒回国。1923年2月发表《人生观》讲演,发起“科学与玄学论战”,宣扬柏格森主

义和心学。1928年与李璜在上海创办《新路》半月刊，鼓吹拉基斯的政治多元论，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力提倡“民主政治”与民主的社会主义。1932年与张东荪、胡石青等在北平创立中国国家社会党，同时创办《再生》月刊，发表《我们要说的话》、《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文章与讲演。1934年7月，在国社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同年出版《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

《明日之中国文化》于1936年8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1967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再版时张君劭写有《再版新言》。当时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中华民族的命运前途问题沉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张君劭在书中《自序》里说：“凡念及吾族之将来者，莫不对于文化之出路问题，为之绕室彷徨，为之深思焦虑；于是有复古之说，有全盘西化之说，……。犹之病者命已垂危，侍之者乱投杂药，以求万一之有效，岂惟不能祛病，正所以速其死耳。”现在到了全面总结清理“五四”以来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理论的时候了。

早在1935年6月，张君劭就出版了《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他编辑此书的目的，“不外乎民族智、情、意之培植，民族性之独立，民族思想之自主，即所论有涉及外国者，如‘五十年来德国学术’序，如‘十九世纪德意志民族之复兴’一讲，无非借外事为例，以资说明。”他认为，值此民族危亡之际，民族复兴的前提是民族的大彻大悟，民族复兴的基础就在于民族文化学术的发展。而文化学术的发展，则必须对文化历史有所了解。今日的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因此必须探求以往之所以失败，才能知道所以自处之道；必须比较各民族在历史中的长短得失，才能明确自己今后行动的方向。在次年

出版的《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中，张君劢系统地介绍并比较了中、西、印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最后认为，只有“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乃吾族今后政治学术艺术之方向之总原则也”，才能“诚举国上下识之真而持之以定，循此方针以养成四万万独立人格为祈向，其终也，……何患吾族文化之不能自脱于沉疴而臻于康强逢吉乎。”

张君劢曾在1923年2月发表《人生观》的讲演，引起“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他的观点是：“……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展，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自身而已。……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人生观》）结论是，“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正如有人指出：在这个理论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现实问题，“科学专注于向外，……其结果为物质文明。欧战终后，有结算二百年之总账者，对于物质文明，厌恶之论已屡见矣。”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的结果，或称科学，或叫物质文明，并不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可以解决世界乃至中国的问题。正像与张君劢同去欧洲游历，回国后发表了《欧游心影录》的梁启超所讲：“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

万能的大梦，如今倒叫起科学破产来。”因此，有必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宋明理学所提倡的心性之学重新检出，用来教育我们的青年，使他们回到“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的传统中去。

同梁漱溟一样，张君勱认为，人类文化正处于一个由西方向东方、由崇尚功利主义向向往道德修养的转变时期。他认为，西方近代以来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表明，科学方法并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这是因为人生观问题是不存在着“推诸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公例。他说：“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人生观》）张君勱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表面上反映了西方现代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但实际的意义却在于当时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中西文化论战上。从此以后，坚持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思想家聚拢在西化的旗帜下，提倡人本主义的一派则采取了现代新儒家的进路。张君勱成了这一派中贯穿几个时代的人物。

作为现代新儒家中的一员，张君勱的思想表现出中国现代保守主义思想家所特有的浓厚道德主义倾向。他强调科学与哲学的区别，强调哲学在人的道德实践方面的功能。张君勱说：“孟子之所谓‘求在我’，孔子之所谓‘正己’，即我之所谓内也。本此意以言修身，则功利之念在所必摈，而唯求一国之均可安可矣。”极言道德与功利的对立，以道德笼罩一切，甚至说：“知礼节而后衣食足，知荣辱而后仓廩实。”（《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张君勱这种思想的保守主义性质是很明显的。

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学者通常称现代新儒家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这一称谓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种保守主义的性质——

它是保守文化，而不一定保守传统政治。他们所持有的文化立场并不等于他们的政治立场，弘扬传统文化并不等于维护或恢复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张君劢一生所追求的就说明了这一点。20年代的张君劢一方面从事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则积极从事政治社会活动。他曾参加起草《国宪大纲》，并著有《国宪议》一书。张君劢一生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论著，宣传宪政思想，主张地方分权和政治多元化。与此相适应，他在主张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对其中的封建糟粕进行了大量的批评。对传统反省的深度有时丝毫不亚于西化派。

张君劢虽然对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兴趣，但他与政治家的区别在于他始终强调政治必须以学术为基础，始终将文化理想和道德精神视为更根本的东西，认为政治和社会的变革必须要有文化和学术的基础才能够成功。在30年代，张君劢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较之20年代要客观、理智。他这时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哲学立场有所转变。所有这些都体现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中有所体现。

《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从中国、西方、印度等不同文化的比较中探求中国文化的出路。全书共十讲，对于欧亚两洲文化的起源、欧洲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发展和特性都做了介绍。第八讲讨论中国文化；第九、十两讲是“明日之中国文化”。附录有《中华民族文化之过去与今后之发展》，全书近8万字。

在书的前半部分。张君劢着重论述了西方文化的特点和其为什么能够在今天成功的原因。同梁漱溟一样，他也将世界文化分成中国、西方、印度三部分，用西方成功的例子和印度不成功的例子与中国进行比较。本书的重点在后半部分，着重讨论了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一是对过去文化的批判，二是对未

来的设想。张君勱从政治、社会、学术、宗教、艺术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评判。

比如政治，张君勱认为中国政治的特点是君主专制，“一人高拱于上，内则有六部九卿，外则有封疆大吏与府县亲民之官；此一人而贤明也，则一国治，一人而昏愚也，则一国乱。”政治专制，无民主的社会基础，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失败之处；但“由此之故，孔孟思想，乃广及乎全国，而成为思想之中心。且由此方法，乃有今日四万万同文之同胞，此即文化之成绩也。”因此张君勱认为，中国君主专制政治的意义，不在政治上，而是在文化上。

中国社会的特点是家族主义。“敬宗尊祖……以姓以氏为社会分子团结之唯一基础。”虽然这对于维护社会的秩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个人在家族中就失去了独立性，与现代社会的要求不符。且大家族年长易朽，滋生出许多腐败。如子弟即与父兄同居，以有父兄可依，便不务正业。

虽然古代学术思想发达，但今日已经落后，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文字的障碍，二是论理思想的缺乏。古代文字复杂，不论是学习还是使用都很困难，容易出错。两千年来，大量的智力从事文字训诂考据，鲜有伟大的思想体系。张君勱认为中国没有论理学，所以“论理学即为凡百学术之母，则论理之消亡，即成为一切学术知识之消亡。吾国即为缺乏论理学之民族，其自然科学自无由之发展矣。”

在宗教方面，张君勱认为中国与西方在宗教观念上最大的不同就是，西方思想中将上帝与人类划为两界，而中国人相信天人和一。这种观念与阴阳五行之说结合在一起，认为许多事可以并行不悖。所以民族兼容并蓄的能量很大。但另一方面，由

于平日天事不离乎人事，因此缺乏事天的诚敬，陷于信仰上的不专一，杂以功利并缺少诚意，更无殉道的精神，成为文化中的一大缺陷。

中国艺术立意超绝，意境深远，如“王维米南官之画，淡墨数行，而富有宇宙无穷之意味，此乃天地与艺术和而为一之所致也。故吾国艺术之长，不仅以‘真’为务，兼具天道与其中；所以为欧人所叹赏者，即在与此。”张君劢认为，艺术与学术迥然不同，学术须受逻辑规则支配，因此是客观的；而艺术则是一种主观的妙手偶得，因此中国的艺术远胜西方。

在对过去评判之后，张君劢总结出中国文化中以下四种短处：

一、政治上以久处君主专制政治之下，故人民缺少独立性。

二、社会上盛行大家庭制度，一方增长个人之依赖心，他方以处于面和心不和之环境中，种下忌刻与口是心非之恶习。

三、学习上受文字之障碍与缺乏论理学的素养，但有支离破碎的思考，思想天才不发展，更缺少伟大的思想系统。

四、宗教上夹杂功利之念，绝少真正之诚意，更少以身殉道之精神。

接着，他提出对未来文化的设想：“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乃吾族今后政治学术艺术之方向之总原则也。”只要各个人发挥其精神上的自由，并将其具体落实在政治、道德、法律、艺术等方面，就会出现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张君劢指出，在自由精神指导下的政治、个人与团体国家是互相依存的双方，国家的法律是保护个人的，个人也能尽心维护国家。他认为，中国应当学习西方这种建立在自由精神之上的政治，以此作为民族国家立国的要义。此外，发展学术要

以精神自由为原则。学术虽然离不开利用厚生，但专以利用厚生为目的的学术是不可能发展的。学术必须摆脱功利主义的控制，强调为真理而奋斗，才能使学术得到发展。西方学术的发展证明，利用厚生是学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发展的动力。在精神自由与宗教的关系方面，张君劢认为，信仰自由应以良心上信仰的真假为标准，也就是以精神自由为前提，而不应参杂功利的目的。至于艺术，中国应该本着精神自由的原则，在以往成绩的基础上开辟新领域，创造新艺术。

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中，张君劢站在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虽然他对传统的某些方面作了肯定，但在这本书中，张氏主要是从批评的角度展开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正像他在《自序》中所说：“中华民族之在今日，如置身于生死存亡之歧路中，必推求既往之所以失败，乃知今后所以自处之道；必比较各民族在历史中之长短得失，乃知一己行动之方向。”

此次重印《明日之中国文化》，将竖排繁体字改为横排简体字。为保持历史原貌，对原书基本未动，只是对书中一些与现在通用译名差别较大的旧译名和生僻的人名、事件作了简略的注释。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指正。

曹跃明

1997年10月于南开大学

释因常以努力新文化相期，
此书之写定，彼实鼓励之。

自序

当欧战之后，梁漱溟先生尝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试翻此书而读之，求中印欧三方面文化之沿革，不可得焉；求三方面各派哲学之内容，不可得焉；盖漱溟先生之目的，在以持中、向后、向前之三点，说明中印欧文化之特质，至于三方面之历史的研究、客观的研究，本不在漱溟先生视线范围之内也。自今日上溯于漱溟先生书出版之时，已十余年矣，国家之形势愈危岌矣！凡念及吾族之将来者，莫不对于文化价值出路问题，为之绕室彷徨，为之深思焦虑；于是有复古之说，有全盘西化之说，乃至就文化之方面提出一种口号者，曰德莫克拉西、曰赛恩斯、曰苏俄主义、曰法西斯主义。犹之病者命已垂危，侍之者乱投杂药，以求万一之有效，岂惟不能祛病，正所以速其死耳。中华民族之在今日，如置身于生死存亡之岐路中，必推求既往之所以失败，乃知今后所以自处之道；必比较各民族在历史中之短长得失，乃知一己行动之方向。吾人研求三四千年中，中印欧民族生活之经过，于是得一结论曰：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乃吾族今后政治学术艺术之方向之总原则也。此原则之所以立，鉴于今日吾族之劣败与欧洲之胜利而知之，鉴于吾族思想上之束缚驰骤与欧洲学术上之辉煌腾达而